

# 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阶层构成<sup>\*</sup>

张文宏 李沛良 阮丹青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go-centered social network composition of urban dwellers in China from a social class perspective. A random sample (n= 1004)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the city areas of Beijing in the summer of 2000. The discussion name-generator approach was employed to measure people's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s. Social class position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levels on the basis of occupation, property rights, authority and skill: (1) professional/administrator, (2) white collar, (3) small proprietor, and (4) working class. Results reveal that a person's social position affects the class composition of his/her social networks. In Beijing, the class compositions of the professionals/administrators and the working class people are less heterogeneous than those of the white collar workers and small proprietors. People in all classes tend to make in-group choices, i. e., selecting discussion network members of similar class status. Compared to the working class people, however, the professionals/administrators have a stronger tendency to maintain a closed social network while the small proprietors are more likely to form cross-class networks. These finding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relatively low degree of differentiation in China's social class structure and by the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faced by people in the different classes.

## 一、研究主题与文献回顾

作为探讨社会结构的两种不同范式, 社会网络分析和阶级阶层分析是相互对立、相互替代抑或是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 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Mitchell, 1969: 1-50, 1973: 15-36; Blau, 1982: 273-279)。社会阶级阶层被界定为人们在不同位置上的分布。这种位置研究方法将社会描述为由相互隔离或断裂的、彼此不联系的、具有不同利益和拥有不同资源的群体组成的结构。阶级分析将财产、权威和技能视为不同的资源, 并用它们来界定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界限(Wright, 1997)。与此相比较, 以网络分析为代表的关系研究方法, 集中分析建立在阶级类别基础上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联系, 其焦点在于确认社会关系的模式, 评估社会网络位置内部和之间社会联系的程度。社会网络分析强调资源调用——这是阶级封闭的一种关键机制——的动态过程。与阶级阶层分析相比, 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研究策略, 它超越了孤立的位置分析, 转向探讨位置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距离(Bian et al., 2003)。借用米切尔(Mitchell, 1973: 15-36)和布劳(Blau, 1982: 273-179)的说法, 笔者也认为网络分析和阶级阶层分析并不是相互对立和相互替代的研究范式, 而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完善的两种各具优势的理论模型。

本文将运用2000年夏天在北京城区进行的大规模调查资料, 从阶级阶层的视角出发, 探讨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阶层构成模式。通过对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的阶层趋同性、阶层异质性和跨

<sup>\*</sup> 本文根据第一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完成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改写而成。该成果是李沛良教授主持的“香港和北京社会网络与健康比较研究”项目(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资助, 编号为CUHK4135/99H)的一部分。除课题负责人以外, 感谢项目参与者陈鹰强教授、彭玉生博士、赖蕴宽博士、阮丹青博士为本项目做出的贡献。北京的抽样调查和入户访问由林彬、刘德寰与郝大海等负责。感谢岭南基金会杨庆堃研究生奖学金、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巴尼校区 Lewis Mumford 比较都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对第一作者提供的研究资助。吕大乐、彭玉生和边燕杰教授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特此致谢。

越阶层界限的网络选择等主要指标的描述,我们将概述阶层地位影响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的一般模式。在与西方社会学家的相关研究发现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我们主要运用“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解释北京调查的有关发现。

在社会学界,从阶级阶层的视角分析人们的社会网络构成模式的成果并不多见。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可能与社会网络分析者所倡导的“反对类别分析”的坚定立场有关(Wellman, 1988),另一方面可能是阶级阶层研究者忽视了社会网络分析者的有关成果。在西方社会学家仅有的几项研究中,研究者均是将关系密切的朋友网络作为分析的焦点(例如,Laumann, 1966, 1973; Goldthorpe, 1987/1980; Wright & Cho, 1992: 85—102; Wright, 1997)。劳曼(Laumann, 1966)在其经典研究中发现,无论哪个阶级的成员,各个层次上的男性最可能从自己或邻近阶级的成员中选择亲密朋友,这个趋势在两个极端(即顶层阶级和底层阶级)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阶级内部选择的趋势在中间阶级中则比较微弱。大体来说,跨越体力与非体力阶级界限的朋友选择在 $1/4$ 左右。后来,劳曼的上述发现在另一项研究中(Laumann, 1973)再次被证实。这个发现被概述为同质性原理,即两个人在地位、态度、信仰和行为方面越类似,越可能形成密切或一致的关系。根据这种理论,占据类似社会经济地位的人通过有价值物品(包括信息与情感交流)和服务的互惠交换促进了密切关系的形成。此外,占据类似社会、经济和政治位置的人享有相似的社会价值观,他们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并对他人产生相同的期待,因此也将采取相近的行为。这些共享的价值、问题和期待,为其共同利益提供了基础。此外,劳曼在其1966年的研究中还证实了“声望性假设”:不管自己的职业地位或阶级身份如何,人们有时倾向于与较高职业地位或阶级身份的人建立密切的社会关系(Laumann, 1966: 53)。

以阶级分析见长的社会分层研究者也在其主要的研究旨趣之外关注到阶级地位对社会网络的影响。例如,当代新韦伯主义的代表人物高索普(Goldthorpe, 1987/1980: 179—180)对1972年英国社会流动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各阶级之休闲伙伴的群内选择倾向尤其明显。服务阶级(service class, 即行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大雇主和企业经理及主管)、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自我选择比例在36%到65%之间。新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赖特(Wright & Cho, 1992: 85—102; Wright, 1997)对于西方四国朋友网络阶级渗透性研究的主要发现是:第一,所有权界限最不容易跨越,意味着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雇主和无产权的雇员不可能在社会交往中成为好友。第二,专业技能界限比较容易渗透,说明拥有专业技能的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有可能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第三,权威界限最容易渗透,表明是否拥有管理决策权并不构成社会交往的障碍。所有权界限最不容易跨越的发现,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剥削和阶级利益的理论预测完全吻合。但是,关于专业技能和权威界限渗透性的研究发现,则与布迪厄的阶级惯习(habitus)理论(Bourdieu, 1984, 1987)及社会交往的机会结构论点(Laumann, 1966, 1973)一致。

在华人社会,熊瑞梅等(1992: 107—38)较早涉及到阶级阶层对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这个主题。她对台湾小资本阶级社会资源状况的研究表明,小资本阶级与受雇阶级的网络中均拥有差别不大的受雇阶级网络资源,表明台湾在劳动力市场的经济行动中不存在明显的阶级藩篱。受赖特有关研究的影响,台湾社会学者从各职业阶层间的社会网络来探讨阶级结构及相关的阶级界限。研究发现,专业技术管理与经理人员、工人、农民,其最好朋友绝大多数均为与本人同阶级者,这显示出友谊网络所具有的高度封闭性和群内选择倾向(孙青山、黄毅志, 1997: 57—101)。一项关于台湾地区社会流动、社会网络与阶级意识的研究发现,工人阶级不仅很可能在本阶级内部建立密切的关系网络,而且对本阶级有较强的认同感(黄毅志, 1999: 42—73)。另外一项关于台湾跨越社会群体结构性社会资本的比较分析指出,就跨越社会界限的交往关系来说,在族群、性别、文化资本和社会阶级四种社会类别中,以跨越社会阶级的交往关系所占的比例最高(53.3%),其次为文化资本、族群和性别。其中,向上实现阶级跨越的占66.6%,向下跨越的占33.4%,这反映出劳曼等发现的社会网络建构的声望性原则或“上攀”效应也存在于台湾社会(陈东升、陈端容, 2001: 459—511)。

最近几年,边燕杰将研究的视角集中于中国城市各阶层的社会网络资本和关系资本。边燕杰

(Bian, 2001: 275—296)对中国四城市居民饮食网络(networks of social eating)的研究发现,大量非家庭关系和工作关系进入城市居民的日常饮食网络,饮食伙伴(eating partners)的选择集中于干部、专业人员和工人的社会阶层内部,这些现象说明饮食伙伴的选择受到明显的阶层差异的支配,意味着中国的关系资源不太可能跨越阶级界限被动员。边燕杰(2003)在其最新研究中按照产权、管理权、专业技能三重标准将城市居民分为行政领导、经理、专业技术、办事人员、技术工人、雇主、自雇和非技术工人8个阶层。他对1999年中国五城市居民拜年网的分析显示,雇主和自雇阶层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联系很可能是暂时性和交易性的,是一种非社会性的交往,随时可以中断,很难转化为稳定的网络联系和社会资本,所以没有包括在具有较高情感和投入的核心“拜年网”中。阶级阶层地位限制了人们自由地拓展社会网络和积累社会资本。边燕杰等(Bian et al., 2003)对1999年调查资料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同职业的城市居民家庭之间更可能相互拜年,说明了网络构建的阶层内选择倾向;而不同职业的家庭之间的互访则显示出阶级界限的跨越效应。尤其明显的是,在工人与其他阶层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隔倾向。在非工人阶层内部,存在着专业技术人员与行政管理人员、经理人员之间的隔离,行政官员与经济行动者(如企业主、公司法人等)之间也存在着界限明显的阶层藩篱。

总结以上国内外有关阶级阶层影响社会网络构成的阶层模式的研究,可以发现:第一,无论是在密度较高和规模较小的朋友网络和社交网络中,还是在密度较低和规模较大且具有一定工具性功能的饮食网络和拜年网络中,发挥中心作用的主要是同质性原则,即阶级阶层地位相同或类似的人最有可能成为社会网络的核心成员。第二,跨越阶级阶层界限的网络建构虽然时有发生,但并不是一种主导趋势,主要发生在中间阶层当中。

## 二、研究架构、研究假设和研究设计

### (一)研究架构

以往的研究表明,人们的社会特征(如教育、职业、收入和家庭背景等等)直接影响到人们的阶级阶层地位(Marsden, 1987: 122—131; Ruan, 1993)。同时,相关的研究也发现,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地位等)对人们的社会网络构成产生了不同的影响(Fischer, 1982; Moore, 1990: 726—735; van der Poel, 1993; Ruan, 1993)。为了检验阶层地位对社会网络构成的单独解释力,在具体的分析模型里,我们均把性别、年龄、婚姻地位等社会人口特征作为控制变项引入回归方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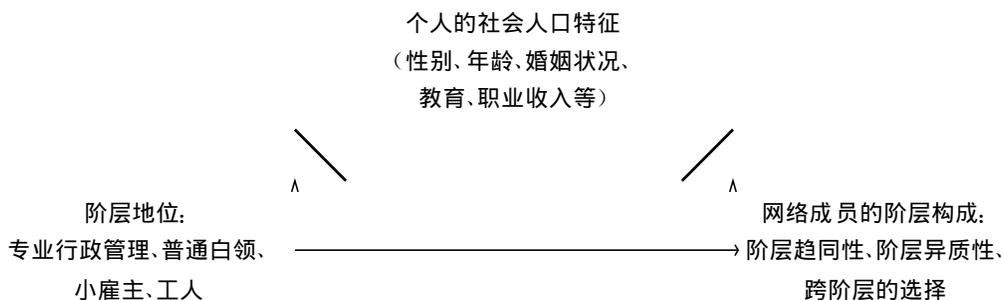


图1. 本项研究架构

### (二)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研究架构和以往的理论模型与研究发现,我们提出的中心假设是:在核心社会网络的建构过程中,同质性原理将作为关键的机制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在跨越阶层界限选择网络成员时,人们将遵循着社会距离原则,选择阶层地位类似的社会成员。

关于网络成员的阶层构成,我们提出以下3个具体的研究预测:

假设 1: 根据社会交往的同质性原理和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 (Laumann, 1973; Blau & Schwartz, 1984), 社会地位结构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机会或限制, 从而使得地位一致的群内交往比群外交往更普遍。因此, 在城市居民核心社会网络的建构中, 我们预测: 所有阶层的成员均具有较强的阶层内选择倾向。换言之, 各阶层在讨论网成员的选择过程中均显示出一种很强的自我选择趋势——简称“群内选择假设”。

假设 2: 按照社会交往的同质性原理和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 有着近似社会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比其地位差异较大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更普遍, 在跨阶层的讨论网成员的选择中, 社会距离较近的邻近阶层的选择将高于跨越几个阶层类别的选择——简称“社会距离假设”。

假设 3: 按照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 处于中间位置的小雇主和普通白领阶层, 将比位于阶层结构顶端和底层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和工人的阶层异质性更高、阶层趋同性更低。换言之, 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工人阶层的群内选择倾向更明显, 而小雇主和普通白领阶层的跨阶层选择网络成员的倾向更明显——简称“中间阶层的跨越效应假设”。

### (三) 资料来源和抽样设计

本文的资料来自 2000 年 7—8 月在北京城市地区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

抽样程序如下:

第一, 首先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方法 (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 简称 PPS) 从北京市中心和近郊 8 个区抽取 12 个街道作为初级抽样单位 (PSU)。第二, 根据 PPS 方法从每个被抽中的街道选取 4 个居民委员会。第三, 从被抽中的 48 个居委会中按照简单随机原则获得 1677 个住宅地址作为调查样本, 再从被选中的住宅中按照随机数表选择被访户。第四, 在选定的被访户中, 由访问员按照基什网格法 (Kish Grid) 选择合适的被访者, 最终成功访问了 1004 位 18 岁以上的在职或退休的城市居民。

从表 1 可以看到, 除了年龄分布以外, 样本和总体在性别、婚姻状况、教育、职业和工作单位所有制等指标上的分布比较接近, 说明本次调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见表 1)。

### (四) 主要指标的操作化测量

社会网络: 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调查的提名问题 (name generator) 直接取自美国综合社会调查中的一个问题: “大多数人时常会和他人讨论重要的问题。在过去半年内, 你和谁讨论过对你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呢?” (Burt, 1984: 293—339) 为了与国内外同类研究进行比较, 该调查沿袭了最多提名 5 名讨论网成员的惯例。除了询问被访者与每个被提名的讨论网成员的关系密切程度、关系类别、认识时间和交往频率以外, 还追问了每位讨论网成员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职业等资料。

#### 1. 因变量: 社会网络的结构指标

(1) 阶层异质性: 首先将网络成员的阶层地位分为专业行政管理、小雇主、普通白领和工人 4 个阶层, 然后按照异质性指数 (IQV) 的标准公式计算 (李沛良, 2001: 53)。在异质性的计算中, 排除了网络规模小于 2 的个案。

(2) 阶层趋同性: 指社会网的核心人物 (即自我) 与其他社会网络成员在阶层地位方面的类似性。趋同性的计算排除了网络规模为 0 的个案 (阮丹青等, 1990: 157—176; Ruan, 1993; 张文宏等, 1999: 108—118)。

(3) 网络成员的阶层地位: 分为专业行政管理、小雇主、普通白领和工人 4 个阶层。

#### 2. 自变量: 阶层地位

结合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及结构功能主义的阶层分类和社会分层标准, 以职业分类为基础, 结合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人们在正式组织中的权威关系、所掌握的专业技能以及教育获得、收入等指标, 笔者初步将中国城市居民划分为如下几个阶层:

(1) 专业行政管理阶层: 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国有和集体企事业单位科级以上行政管理人员, 大中型企业厂长或经理, 接受过大专以上正规教育且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 如工程师、医生、护士、

律师、会计师和大中小学专职教师等。

(2)小雇主阶层:主要包括私营/民营、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所有者或法人,雇工或不雇工的公司或企业的所有者,包括个体工商户、家庭小业主以及自我雇用者。

(3)普通白领阶层: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事业单位没有行政职务的一般科员、文员,在公司或企业工作的职员、商业服务业的非体力职员(如银行职员、商品推销人员)等。

(4)工人阶层:从事体力劳动的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

表1 样本基本资料与北京市统计资料的对比

指标	样本	总体	指标	样本	总体
	%	%		%	%
性别 <sup>①</sup>			教育程度 <sup>①</sup>		
女	53.5	50.1	小学及以下	13.2	20.8
男	46.5	49.9	初中	27.7	32.4
N	1004	6579000	高中/中专/技校	33.3	26.3
			大学专科以上	25.8	20.5
			N	1003	8972
年龄 <sup>②</sup>			职业 <sup>⑤</sup>		
18—29岁	10.5	29.2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负责人	6.2	6.5
30—39岁	18.3	32.7	专业技术及辅助人员	32.8	19.9
40—49岁	28.9	27.2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13.4	12.3
50—59岁	15.7	8.7	商业服务业人员	11.0	27.6
60岁以上	26.6	2.3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36.6	33.7
N	1002	679849	N	936	599307
婚姻状况 <sup>③</sup>			单位的所有制类别 <sup>⑥</sup>		
未婚	9.8	18.7	国有	81.2	78.5
已婚	83.4	74.7	集体	11.3	14.2
丧偶	5.3	5.1	个体/私有/三资	7.5	7.3
离异/分居	1.5	1.5	N	932	4563000
N	1004	8022			

资料来源:①北京市统计局编,2001:70,《北京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性别比例以调查所涉及的北京城市8区常住户籍人口的绝对数计算得出。

②④北京市第五次人口普查办公室、北京市统计局编,2002:850—876,《北京市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年鉴社。该相对数根据北京市2000年人口普查之10%抽样调查资料中15岁及其以上的各职业人口的分年龄组的绝对数(剔除15—17岁的人口)计算,农业户籍的在职者也包括在内。职业的总数也来自该抽样调查,同样也包括了农业户籍的在职者。

③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2001:47—49,《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表中相对数根据1999年北京城市地区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资料计算得出,教育获得和婚姻状况都是6岁以上人口的数字。

⑥段柄仁、张明义主编,2001:589,《北京年鉴:2001》,北京年鉴社。

按照上述划分阶层的操作性标准,在938名有效被访者中,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占32.8%,普通白领阶层占16.1%,小雇主阶层占3.8%,工人阶层占47.2%。在回归分析中,将阶层变项编码为4个虚拟变项,通常以工人阶层作为参考类别。

3. 控制变项:我们在分析中将性别、年龄和婚姻地位作为控制变项,以考察阶层地位对于网络构成变项的独立影响。

### 三、研究结果与发现

#### (一)“群内选择假设”的有关发现

表2用交互分类方法对自我和网络成员的阶层地位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发现各阶层之讨论网成员的阶层构成的观察频数与期望频数及其百分比分布。观察频数分布即在样本中实际归属于某一阶层

的个案数。观察频数的百分比即根据表 2 第一部分的实际归属于某一阶层的个案数除以行总数得出,如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观察频数  $72.1\% = 295/409$ 。期望频数根据某一阶层的列频数合计与样本总数的比例计算得出,即表 2 第二部分下端的百分比,比如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期望频数  $43.2\% = 465/1077$ 。从表 2 第一部分观察频数分布和第二部分观察频数的百分比分布可以发现,除小雇主阶层外,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普通白领阶层和工人阶层在自己阶层内选择讨论网成员的比例都是各阶层组别中最高的,按照观察频数的比例,分别达到了  $72.1\%$ 、 $47.1\%$ 和  $57.5\%$ 。但是,小雇主阶层的阶层内选择比例仅仅为  $7.0\%$ ,他们选择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普通白领阶层的比例则高达  $58.1\%$ 和  $23.3\%$ (见表 2)。

表 2 自我与网络成员的阶层地位的交互分类表

自我的阶层地位	网络成员的阶层地位				合计 N
	专业行政管理人员	小雇主	普通白领	工人	
<b>观察频数分布</b>					
专业行政管理人员	295	10	42	62	409
小雇主	25	3	10	5	183
普通白领	45	7	86	45	43
工人	100	16	72	254	442
合计	<b>465</b>	<b>36</b>	<b>210</b>	<b>366</b>	<b>1077</b>
<b>百分比分布</b>					
专业行政管理人员	72.1	2.4	10.3	15.2	
小雇主	58.1	7.0	23.3	11.6	
普通白领	24.6	3.8	47.1	24.6	
工人	22.6	3.6	16.3	57.5	
期望频数	<b>43.2</b>	<b>19.5</b>	<b>3.3</b>	<b>34.0</b>	

说明:该结果以自我所提出的网络成员为分析单位。

Pearson  $\chi^2 = 359.34$ , D. F. = 9,  $P < 0.000$ , Lambda = .319(网络成员的阶层地位作为因变量)

仅仅从交互表的频数分布并不能很好地发现阶层地位对网络成员选择的真实影响,因为交互表的横向或纵向百分比受制于行列合计的分布,没有可比性,而对数线性模型(loglinear model)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彭玉生, 2001: 324—331)。从表 3 自我与网络成员阶层地位的对数线性分析的结果也可以发现,任何阶层地位的人在建立自己的密切讨论网时,均显示出一种非常明显的阶层内选择趋势。对数优比(log odds ratio)更直观地表明讨论网成员选择的阶层封闭效应。表 3 黑体部分的参数(即对角线部分)不仅表明各阶层在所属阶层内部选择网络成员的观察频数与期望频数的比率均大于 1,而且该比率也大大高于选择其他阶层的参数值。这个趋势在居于上层地位的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位居下层的工人阶层中更明显(见表 3)。表 3 的结果证实了假设 1,即所有阶层的成员在选择讨论网成员时均具有较强的阶层内聚集倾向或明显的自我选择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交往中的阶层隔离和阶层封闭倾向。

## (二)跨越阶层界限的网络成员选择——“社会距离假设”的经验发现

从表 3 的结果还可以发现,除了网络成员的阶层内选择这一主要倾向以外,阶层地位邻近的社会成员之间的选择是另一种趋向。从经过对数转换的观察频数与期望频数的比率来看,除了选择自己阶层内的成员以外,专业行政管理人员依次选择小雇主、工人和普通白领(参见表 3 第 1 行的对数优比),小雇主依次选择专业行政管理人员、普通白领和工人(参见表 3 第 2 行的对数优比),普通白领依次选择工人、小雇主和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参见表 3 第 3 行的对数优比),工人则依次选择小雇主、普通白领和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参见表 3 第 4 行的对数优比)。上述结果基本上说明,阶层地位越接近、社会距离越小的成员越可能成为核心社会网络的成员。此外,作为中间阶层和处于地位爬升阶段的小雇主,在对两个邻近阶层的選擇中,选择地位较高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的机率明显大于选择地位较低的一般白领,选择

前者的机率比后者高 32% (1.33-1.01), 显示出小雇主在选择核心的密切网络成员时有一种明显的“上攀”倾向 (见表 3)。这组结果大致上验证了假设 2 的预测。

表 3 自我与网络成员阶层地位的对数线性分析: 饱和模型

自我的阶层地位	网络成员的阶层地位			
	专业行政管理人员	小雇主	普通白领	工人
专业行政管理人员	.850(2.34)	-.235(1.05)	-.463(.63)	-.152(.86)
小雇主	.288(1.33)	.466(1.59)	.008(1.01)	-.762(.47)
普通白领	-.571(.56)	-.132(.88)	.714(1.43)	-.011(.99)
工人	-.567(.57)	-.259(1.07)	-.099(1.00)	.925(2.52)
与独立模型的比较	对数似然比 $X^2$	D. F	BIC	
独立模型	1306.99	9	1261.96	
饱和模型	0	0	0	

说明: 该分析以自我所提出的讨论网成员为单位, N=1077。参数为观察频数与期望频数的对数优比(log odds ratio), 括号内为转换以后的观察频数与期望频数的比率。

### (三)“中间阶层的跨越效应假设”的相关发现

从表 4 模型 2 的结果可以发现阶层地位对网络成员阶层异质性的具体影响。在控制了性别、婚姻状况和年龄等人口特征以后, 小雇主和普通白领阶层的阶层异质性指数比工人阶层高 5.5% 和 8.9%。按照阶层异质性指数的高低次序, 依次是普通白领、小雇主、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和工人。尽管小雇主的阶层异质性指数高于工人阶层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 但是上述结果与假设 3 的预测方向一致。这个结果部分基本支持了假设 3。模型 2 比模型 1 的消减误差比例有所提高, 说明阶层地位对于网络异质性产生了独立的影响, 但是模型 2 的消减误差比例并不十分理想 (3.7%) (见表 4)。

表 5 是阶层地位影响网络成员阶层趋同性的回归分析结果。阶层异质性是反映网络成员 (不包括自我) 之间阶层地位多元化的一个指标, 而阶层趋同性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描述了自我与网络成员在阶层地位方面的一致性程度。从表 5 模型 2 的结果可以看到, 在控制了性别、婚姻状况和年龄等人口特征以后, 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选择自我阶层的人数多 0.68 人 ( $P < 0.001$ ), 在一个平均仅为 3.1 人的小规模讨论网中, 上述数字的差异非常明显。相反, 小雇主阶层则比工人阶层选择同阶层的人数少

表 4 阶层异质性的回归分析

自变项	模型 1	模型 2
常数项	.395(.047) ***	.365(.049) ***
男性	-.026(.025)	-.023(.026)
已婚者 <sup>1</sup>	.056(.035)	.049(.035)
年龄	-.004(.001) ***	.004(.001) ***
阶层地位 <sup>2</sup>		
专业行政管理人员		.038(.029)
小雇主		.055(.069)
普通白领		.089(.037) *
R <sup>2</sup>	.024	.031
F-Test	8.33 ***	5.24 ***
D. F	3	6
N	938	938

说明: 系数为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 括号内为标准误。  
+  $P < 0.10$ ;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单侧检验)。

1. 参考类别为未婚者和离婚、分居及丧偶者。
2. 参考类别为工人阶层。

表 5 阶层趋同性的回归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常数项	1.394(.142) ***	.097(.346)
男性	-.019(.076)	-.015(.074)
已婚者 1	.322(.105) *	.037(.117)
年龄	-.014(.003) ***	.050(.016) **
阶层地位 2		
专业行政管理人员		.682(.084) ***
小雇主		-.659(.198) **
普通白领		-.003(.107)
R <sup>2</sup>	.033	.113
F-Test	11.46 ***	21.15 ***
D. F.	3	6
N	935	

说明: 系数为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 括号内为标准误。  
+  $P < 0.10$ ;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单侧检验)。

1. 参考类别为未婚者和离婚、分居及丧偶者。
2. 参考类别为工人阶层。

0.66人( $P < 0.01$ )。普通白领阶层虽然也比工人阶层选择同阶层的人数少0.003人,但是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该方程的削减误差比例达到11.3%,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模型2比模型1的削减误差比例增加了8%,说明阶层地位对网络构成的阶层趋同性选择具有明显的独立影响(见表5)。上述结果与假设3所预测的方向一致,即作为中间阶层的小雇主和普通白领的阶层趋同性指数低于顶层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和底层的工人阶层。由于普通白领的阶层趋同性指数在统计学上不显著,该结果仅仅部分证实了假设3(见表5)。

#### 四、结论与讨论

关于阶层结构影响网络成员阶层地位构成的主要发现是:

1. 各阶层在选择讨论网成员时的群内选择或自我选择倾向非常明显。
2. 阶层地位邻近、社会距离较小的人们成为讨论网成员的可能性较大。
3. 处于阶层结构顶端和底端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和工人的阶级异质性指数较低,位于中间阶层的小雇主和普通白领的阶层异质性指数较高,普通白领的阶层异质性指数明显高于工人。同工人阶层相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群内选择倾向更明显,小雇主的阶层趋同性指数最低。

我们的上述发现再次验证了西方社会学家提出的“同质性原理”(Laumann, 1966, 1973; Blau, 1977),即群体内的交往比群体外的交往要普遍的多。各阶层在建立和发展密度和信任度较高的社会网络时,选择与自己阶层地位相同或类似的成员,并不是人们具有一种“自恋”的心理倾向,而是由于人们在宏观社会结构中占据着相同或类似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而阶层地位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的综合反映。这说明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条“阶层界限”。在建立和维持社会网络的过程中,各阶层中间普遍存在的自我选择倾向实际上也反映了阶层藩篱的客观存在,这种藩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阶层之间的相互隔离和自我封闭。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体内部成员的相互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阶层的内聚与整合,有助于人们形成自觉的阶层意识。

阶层地位邻近的人更有可能成为讨论网成员的发现,实际上是社会交往同质性原理的扩展。任何人都不太可能仅仅在自己阶层内选择讨论网的成员,当人们一定要跳出自己的小圈子建立社会网络时,那些与自己阶层地位邻近的潜在成员便成为他们的首选。在我们的分析模型中,如果按照权威、职业声望、教育获得和收入等指标来测量,阶层地位大致上是按照专业行政管理者、小雇主、普通白领和工人的顺序自上而下排列的(张文红, 2003: 99—102)。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产生“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在选择讨论网成员时倾向于与其地位距离较小的小雇主和普通白领阶层而非地位距离较大的工人阶层,普通白领阶层倾向于与自己阶层地位距离较小的小雇主阶层而非工人阶层”这种现象了。

我们的结果也再次验证了劳曼三十多年以前的发现,即“阶层内选择的趋势在中间阶层特别是文员和小业主中比较微弱”(Laumann, 1966: 30)。无论按照什么标准来界定中国当代社会的中间阶层,小雇主和普通白领都属于广义的中间阶层(张宛丽, 2002: 249—271)。小雇主和普通白领两个阶层的阶层异质性较高,其实也反映了这两个阶层的自我隔离倾向不像专业行政管理阶层那样明显。同工人阶层相比,普通白领的阶层异质性较高,小雇主的阶层趋同性指数较低,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说明,这两个处在中间地位的阶层,试图通过与各阶层的交往来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为将来有机会提升自己的阶层地位打好社会关系的基础。这种需要对于阶层地位相对不稳定的小雇主阶层而言尤其迫切。一方面,小雇主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阶层,虽然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雇佣劳动的支配权,但是他并不像专业行政管理阶层那样拥有中国当代社会的综合地位优势——后者控制着社会的大部分行政组织资源、政治组织资源和文化技术资源(陆学艺主编, 2002)。小雇主的复杂社会来源也使这个阶层长期处于边缘的游离状态。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虽然使小雇主阶层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并没有改变其社会声望较低、在社会结构中仍然处于边缘状态的现实。小雇主希望通过与

占据社会上层位置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的交往,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提高自己的声望,进而达到调动社会资源、实现自己的工具性或情感性行动的目标。另一方面,小雇主阶层的规模相对较小。在我们的样本中,小雇主阶层仅占3.7%。布劳(Blau, 1977)曾经指出,在一个地区的阶层结构中,如果各阶层的规模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那么人们同其所属阶层的成员交往的机会将随着阶层规模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小雇主相对较小的阶层规模促使该阶层的成员跳出自己的小圈子来建立社会网络,这是阶层规模效应的表现。

同时,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的群内选择倾向更明显的事实,印证了前者试图通过阻止其他阶层的侵入,以保护其作为上层精英的既得利益。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当中存在着类似韦伯所说的“社会封闭”。在韦伯看来,社会封闭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某些社会集团惯用的一种手段,它们试图通过把奖励和机会限制在适当人选的范围内,最终达到使自身奖励最大化的目标。帕金则进一步发挥了韦伯的社会封闭概念。在帕金看来,统治阶层通过排他来维持和增强自身的特权,而那些被排挤的阶层因不能采取“排他”策略转而采取“内固”手段,这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促成了社会封闭现象(Parkin, 1974)。吉登斯(Giddens, 1973)也认为,社会封闭是阶层形成的基本条件。作为中国当代社会上层精英阶层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控制着中国社会的多数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他们在与其他阶级阶层的交往中,往往坚守着明确的界限,从而防止可能的资源流失和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占据上层地位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在社会交往中也往往表现出主导性的角色。各阶层在选择讨论网成员时所具有的非常明显的自我选择倾向,证明了西方学者在友谊关系和一般社会交往中得出的同质性原理(Laumann, 1966, 1973; Blau, 1956; 290—295, 1977)在不同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具有某种普遍意义。

概言之,在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成员的选择过程中,发挥中心作用的机制主要是同质性原理,声望原则或“上攀效应”仅仅表现在小雇主阶层中。与此相一致,阶层内部的选择是中国城市居民构建和维持社会网络的主要倾向。社会网络成员选择过程中的阶层界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障碍。小雇主与其他阶层的社会渗透性较强。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成员选择的阶层模式与中国宏观社会结构的现状一致。

#### 参考文献:

- 北京市第五次人口普查办公室、北京市统计局编, 2002《北京市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
- 北京市统计局编, 2001,《北京统计年鉴: 2001》, 中国统计出版社。
- 边燕杰, 2003《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 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工作论文, 即将发表。
- 陈东升、陈端容, 2001,《台湾跨社会群体结构性社会资本的比较分析》, 刘兆佳、尹宝珊、李明坤、黄绍伦编,《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貌: 华人社会的比较》,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
- 段柄仁、张明义主编, 2001,《北京年鉴: 2001》, 北京年鉴社。
- 黄毅志, 1999,《社会阶层、社会网络与主观意识: 台湾地区不公平的社会阶层体系之延续》, 远流图书公司。
-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 2001,《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001》, 中国统计出版社。
- 李沛良, 2001,《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陆学艺主编, 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彭玉生, 2001,《定序或定类依变量回归分析》, 李沛良,《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阮丹青等, 1990《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初析》,《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
- 孙清山、黄毅志, 1997,《台湾阶级结构: 流动表与网络表的分析》, 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九零年代的台湾社会: 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研究系列二》。
- 熊瑞梅、黄毅志, 1992《社会资源与小资本阶级》, 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与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合编,《中国社会学刊》第 16 期。
- 张宛丽, 2002《中国中间阶层研究报告》,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 张文红, 2003《中国城市的阶级结构与社会网络》, 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社会学部哲学博士论文。
- 张文宏、阮丹青等, 1999《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 Bian, Yanjie 2001, "Guanxi Capital and Social Eating in Chinese Citie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Analyses." in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eds.) by Nan Lin, Karen Cook & Ronald S. Burt, Aldine De Gruyter, New York.
- Bian, Yanjie, Ronald Breiger, Deborah Davis & Joseph Galaskiewicz 2003, "Network Patterns and Class Closure in Urba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unbel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ancun, Mexico, February and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tlanta, August.
- Blau, Peter M. 1956 "Social Mobi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1.
- 1977,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82, "Structure Sociology and Network Analysis: An Overview." in Marsden, Peter & Nan Lin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London/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 Blau, Peter M. & Joseph E. Schwartz 1984, *Crossing Social Circl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7, "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istence of Group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32.
- Burt, Ronald S. 1984, "Network Items and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Social Networks* 6.
- 1998, "The Gender of Social Capital."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0.
- Fischer, Claude S. 1982,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 Goldthorpe John H. (in collaboration with Carriana Llewellyn and Clive Payne). 1987/1980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2<sup>nd</sup>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Laumann, Edward O. 1966 *Prestige and Association in an Urban Community*,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 1973, *Bonds of Pluralism: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Urban Social Network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Marsden, Peter V. 1987,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 Mitchell, J. Clyde 1969 "The Concept and Use of Social Networks." in J. Clyde Mitchell (ed.),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ituations: Analyses of Personal Relations in Central African Tow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for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Zambia.
- 1973, "Networks, Norms and Institutions." in Jeremy Boissevain & J. Clyde Mitchell (eds.), *Network Analysis Studies in Human Interaction*, Mouton/The Hague/Paris: Mouton & Co.
- Moore, G. 1990,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Men's and Women's Personal Network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 Parkin, Frank 1974 *The Social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London: Tavistock.
- Ruan, Danching 1993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 van der Poel & Mark G. M. 1993, *Personal Networks: A Ration-Choice Explanation of Their Size and Composition*, Swets & Zeitlinger B. V., Amsterdam/Lisse.
- Wellman, Barry 1988 "Structural Analysis: from Method and Metaphor to Theory and Substance." in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eds.) by Barry Wellman & S. D. Berkowitz,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Erik Olin 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Erik Olin & Donmoon Cho 1992 "The Relative Permeability of Class Boundaries to Cross-Class Friendship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Sweden, and Norwa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作者 张文宏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高校社会学 E 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博士  
 李沛良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 博士  
 阮丹青系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博士  
 责任编辑: 张宛丽